

从汽车限购看社会理性

谢小军

汽车限购成为两会的一个话题,有委员建议取消限购,也有委员建议采取更严厉的限购措施。这里且不谈谁的提案好,我想,一种好的公共政策,至少应能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促进社会理性的发展。

购买汽车是一种个人行为,它符合人们追求更好物质生活的心理期待,显然也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会促进社会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行为中的个人理性能促进社会利益是有外部约束条件的,如果放任人的自利行为,那恐怕就不是给社会带来利益,而是灾难了。个人的理性往往从个人利益立场出发,有时换来社会的非理性。比如考公务员,大家一窝蜂都去考,是大家都不理性吗?其

实多数人是理性的,是他们对自己职业发展做出的一种尝试。人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无可厚非,但一旦某种职业理想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时,那么这种个人的理性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价值选择的非理性,势必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延缓社会发展。难以想象,一个人人都想着去当官的社会会是什么样?购车也一样,人人都有买车的权利,但大家都去买车(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环境代价、能源代价、交通代价都会是惊人的。北京环路上拥堵的滚滚车流,其实就凸显着社会运行的非理性。因此,国家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极其必要。从这个角度看,备受公众关注的车辆限行限购政策有其积极的意义,只是从政策的操作层面有提升的空间(如公平、公正)。国家意志应带有超前的指引性和前瞻性,它超越个人意志甚至偶与其相矛盾,如国家号召建设节约型社会,倡导公民节约资源能源,这与部分公众追求生活条件最优化是有矛盾的。

要实现社会理性地发展,除了外部强制的约束外,还要提升个人的思想意识,在更大程度上发扬人性中非利己的其他价值选择。普遍的个体意识自觉实质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包括生态文明观念都应融入我们的文化中,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实现社会理性,提升个人理性的水平尤为重要。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现实生活在复杂的且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人们掌握的信息总是有限的;收集信息是有成本的;进行计算和权衡比较也是有代价的;人的智力更是有限,从而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学识水平、信息供给都可显著提高个人理性水平。

一个显著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曾发生过抢盐、抢板蓝根事件中,如果人们能随时接触到有公信力的信息渠道,便不容易跟风哄抢,极端事件中出现的个人盲从很大程度上可解释为信息闭塞、信息不透明条件下的抉择。在缺乏足够的信息时,我们通常会一边观望别人,一边收集信息、拼拼凑凑。比如,很少有人会选择一家空荡荡的饭店吃饭,而放弃另一家门庭若市的饭店,从众或模仿这种本能在信息匮乏的时候显得尤其突出。

社会的运作和发展离不开个人理性,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也有一致的时候,但由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内在价值追求的不统一,它们在很多时候又是矛盾的,个人理性不会自发成为社会的理性。如何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理性的建构,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协调,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代表委员热议农村学子的“知识无力感”

多只眼睛看两会

左朝胜

两会观察

两会是中国人去年过日子的大盘点,也是今年过日子的细盘算。每个代表委员都有义务提交提案提案,常常是“敲锣卖糖各干一行”,议案提案也大都结合自己所熟知的本行”。议案提案也大都会结合自己所熟知的本行”。议案提案也大都会结合自己所熟知的本行”。议案提案也大都会结合自己所熟知的本行”。

议案提案看两会。代表委员三百六十行,议案提案自然也是三百六十行。每年几千份的议案提案,足以作为国家如何“过日子”的一个重要看点。两会期间,晒晒议案提案,肯定是个吸睛的好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议案或提案:把所有的议案或提案都公之于众,并跟踪报道每一件议案或提案的办理结果。通过议案提案看两会,看代表委员;是不是勤政高效,是不是心系百姓……

新媒体看两会。微信上说,春晚当天,华为公司12000000个红包,在1分钟内就被抢光,那就意味着一分钟内有12000000人认识了“华为”这个品牌。两会三千多个中外记者,谁与新媒体没有瓜葛?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大路通罗马。电脑、

笔记本、iPad、手机……打开就看,自由选择。看好了就点赞,不高兴就开骂。社会监督不再是记者的专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改变了舆论传播的传统方式,也将大众传播变成了大众的传播。透过新媒体看两会,可能看的更加多、更加广、更加细、更加全,新媒体渐成社会舆论新常态,新媒体看两会也就成为新常态。

唇枪舌剑看两会。一致通过、全体欢呼、掌声如潮、毫无悬念的东西自然要看。但是,近年来在两会上出现了一些观点相左引起争议,甚至激烈辩论唇枪舌剑的东西,是更有价值的看点。从天可不可以到,水可不可以清;从医可不可以保,到教可不可以学;从房可不可以买,到城可不可以建;从民可不可以移,到官可不可以安……还有GDP的增速,还有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有科技投入的科学,还有改革开放的红利。为什么中国高铁跑这么快?为什么合资汽车越来越贵?为什么国企垄断不能动?为什么利益分配不透明……代表委员活语越来越流利,质问之声越来越高!百姓看点在此,国家希望在此。

多只眼睛看两会,不畏雾霾,不让乱花迷,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民企工人理应平等退休

王钟的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撰文指出,在民营企业从事特殊工种的职工,想要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时,却被告知:他们所在的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照国务院规定,不能享受这一退休待遇。她建议国务院法制办修改上述规定,统一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从事特殊工种的职工提前退休标准。“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即可办理退休。

提前退休的差异化规定,源自37年前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这份文件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同一年,却一直“暂行”到现在。在当时民营经济堪称微不足道的年代,将工人局限于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等,看上去并无不妥,也没有引发过什么争议。但如今,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吸纳了城镇就业的80%和每年新增就业的90%,工人的结构比例早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则不宜沿用上一个时代的政策了。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工人在福利待遇方面有差异,并非新鲜事。在市场领域,由企业自行制定的福利,自然由市场竞争来衡量。有的企业待遇好,有的企业待遇差,在这种情况下,既能够推动人才流动,也是企业外在竞争力的体现。然而,如果差异由政策法规限定,就成了规则的不公。《暂行办法》中将“特殊工种”定义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

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大量民营企业已存在类似岗位,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工人,与他们的国企同行相比,却不得不多干好几年。

如果修改这一规定,将民营企业中的特殊工种工人纳入其中,政策推行中当然会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可能短时间内有大量工人退休,给社保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二是达到年龄的工人,感官尚有余力,希望多工作几年,不愿意退休。然而,既然有国企员工提前退休的规定存在,就说明了负担这么一批工人,让他们早点养老,早就有成熟的流程。至于不愿意提前退休的工人,让他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多干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房琳琳)“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从最近媒体的报道和网上的评论也可以看得出来,全国人民有很多期待,国际社会也比较关注。”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新闻发言人傅莹率先提出这个焦点话题,随后在回答多家媒体提出的环境保护、上调燃油税、家庭暴力等热点问题,也多围绕全国人的立法工作开展。

“今天早晨我拉开窗帘,看到蓝天白云,心里充满了感动。”中外记者云集,面对“无冕之王”们对环保问题的关切,傅莹现身说法了一番。她认为,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新环保法是一部“有牙齿”的法律,“对污染必须‘零容忍’。”

“一系列相关的法律都要‘动大手术’。”她介绍,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组织修改;水污染防治法要在组织执法检查后开始修改;全国人大下决心制定一部法律专门解决成因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

“油价下跌,财政部‘趁机’上调了燃油税。”记者的问题引来一片笑声,似乎对此颇有同感。“税收法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的立法原则,“为什么财政部能如此随意地调整燃油税,全国人大不是没有职责吗?”

问题很“刺激”,但傅莹回答有道。她首先澄清,大部分税种是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来规定的。然后她肯定地说:“这些年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随后,她话锋一转,“国家通过法律管理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税收法定’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她进一步说明,在本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专属立法权做了明确地规定,“主要是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等”。

“明天是正月十五,我在这里祝福大家羊年吉祥、阖家安康。”以此开场的傅莹,在一连串尖锐问题的“轰炸”下,始终保持着经典的优雅和从容。在回答记者关注的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时,她直言虽然难点很多,但“反家暴立法,反映的是国家对弱者的关心,是用立法的形式来申明,哪怕是在家庭内部,哪怕是在家庭成员之间,也不允许暴力行为”。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傅莹介绍本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工信部将弱化以往规划中“五年”的时间限制,规划年限扩展到2025年,更注重中长期规划。此次规划的关键词与“向工业强国转型”相关,并将形成注重顶层设计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很快要上报国务院。”

我国国防费适度增长 为强军提供物质支撑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李宣良)“我国国防费适度理性增长,充分考虑了国家安全的需要,充分彰显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決心。”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3月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离不开坚强的物质支撑。我国军费的投向投量更加科学合理,军费的使用效益正稳步提高。”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4日表示,提交大会审议的预算草案建议2015年国防费预算比上年增长约10%,增幅比上年的12.2%略有回落。“国家安全需要有多大,国防投入就有多大;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国防投入就跟进到哪里,这是考虑国防投入必须遵循的规律。”陈舟说。

这位长期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国防费增长需求是由不断上升的国

家安全需求决定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国防费增长是“刚性需求”。

在陈舟看来,这种“刚性需求”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适应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发展的需要,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需要,是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适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需要,是适应军队任务拓展、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需要。

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4%,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与此同时,国防投入仍保持着两位数数的增长。对此,陈舟认为,要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和国防投入之间的联系,富国和强军是辩证统一的,“大炮”和“黄油”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

国防费投入是一把“双刃剑”,过高或过低都不可持续。世界主要国家调控军备的经验表明,军费保持在占GDP的2%—4%区间内,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能够总体保持协调。

“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是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双赢’的战略之举。”陈舟说,军费开支通过市场纽带最终都要流向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军费投入对国民经济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我国国防费的管理使用是公开透明的,有限的军费主要用于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新、官兵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作为我国国防白皮书的起草专家,陈舟认为,中国军费的投向投量总体上科学合理,效益不断提高。

人才是战斗力的核心,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保留,同样离不开财力保障。“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环境下,适当提高军人工资待遇水平,有利于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升职业荣誉感,激励广大官兵更好地履职尽责。”陈舟说。

新环保法执行难在哪?

本报记者 张佳星

两会声音

“保护湖泊,要立法”,2001年,身在“百湖之市”武汉的李长安以学者身份奔走呼吁。他用“上蹿下跳”形容当时的状态,“游说同僚、争取支持、联合发声”,“武汉市人大对我们的建议很重视”。

2002年3月1日,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湖泊保护法《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开始施行。“好!湖泊有救了!”李长安很高兴。不过,好景不长,触目惊心的景象就映在他眼前。

3月4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李长安委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武汉湖泊被破坏、被充堵最严重的,恰恰是湖泊保护条例颁布那一年,‘执法困难,追责无主’,随后的2005年到2008年水质破坏

最快。”

“新的环境保护法,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追责主体。”李长安说,“环保组织能起诉了,案能立了,能走法律程序了。”

那么,新环保法执行有没有难度?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委员表示,新环保法让工作中的力度和可操作性都有增强,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国家、省级的重视程度高一些,越往下越衰减”。

“法律程序的取证环节还要磨合。”潘碧灵说,对超标企业追究刑事责任要严格取证,必须到省级监测站获得,“取证时间、力量、经费都是问题”。

“但是生态不能等啊。”李长安有些着急,他担心磨合的时间太久,“曾是武汉水源地的东湖已经劣五类了,长江流域如果少了后尘,后果不可想象。”

“长江流域还存在一个跨区域的问题。”李长安认为,行政壁垒会影响执法效率,“应该设立一个全流域的行政管理部门。”

“跨县市、跨省市的区域合作防治缺乏一个责任主体。”国家住建部专家委员张泓铭委员在提案中也有同样看法,“区域内每个地方有责任,主管部门也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等于都没有责任。没有一个行政主体直接负责,法律的板子会打空。”

这样的行政区划已有先例可循,李长安介绍,神农架林区的设置可以效仿。它是湖北省的独立行政单位,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保住林子。“武汉梁子湖需要这样的市级行政区,作为4个市之间的内陆湖还保持在二类水质,它的生态多样性不可多得,破坏了就不可能恢复了。”

张泓铭也对“一个责任主体”提出设想。他在提案中描述了主体应具备的特点,“全区环境具有责任主体的行政机构”、“同省市环保机构保持管理关系”、“环保成本分摊清晰”。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中国制造2025》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刘晓莹)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在4日上午的政协分组讨论时透露:“目前,工信部与工程院正在制定《中国制造2025》规划,很快要上报国务院。”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工信部将弱化以往规划中“五年”的时间限制,规划年限扩展到2025年,更注重中长期规划。此次规划的关键词与“向工业强国转型”相关,并将形成注重顶层设计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很快要上报国务院。”

别让国家实验室一“筹”莫展

(上接第一版)

“这给国家实验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灿说,“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主要专注于某项技术或者某个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而国家实验室必须立足于一个大的科研领域,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领域。”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好比们熟悉的LED灯,基于这项技术就可能建立起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目标即是LED照明技术中的基础科学研究搞得很好;而如果是一个照明领域的国家实验室,那就要求它在照明的方方面面都做研究,比如室内照明、公路照明等,以及照明这个领域的各个学科分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这个观点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沈保根很有共鸣。“细节问题大领导不管,小领导说了不算。久而久之,就成了绊住国家实验室发展的大问题。”他说。

李灿告诉记者,目前,中央财政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研究采取稳定支持机制,受到科技界普遍肯定,而国家实验室目前还是“研究经费的来源仍是以为竞争为主,稳定支持的份额很低”。“这就造成研究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竞争资源,难以潜心研究,难免会影响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生。”

除了稳定的财政支持,尚不完善的体制机制也成为令国家实验室“愁”建的主要原因。在2015年的首届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惠民就表示:“体制机制问题体现在很多细节问题上,比如国家实验室的主管部门问题,人员的编制问题等。看似小问题,其实都是关乎实验室发展的大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体制机制问题才能解决。”

李灿也坦言:“国家实验室筹建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我感觉得到的很可惜。如果国家实验室建设继续拖延下去,我们会错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比起李灿,王梅祥显得更加乐观:“去年两会,我的一份关于‘全面深化国家实验室建设改革’的提案被选为重点提案,又成为常委会常务委员会督办提案,在今年的首届政协双周座谈会上,财政部还表示对国家实验室已预备了稳定支持,我希望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在今年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实验室是美欧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创新载体,我们需要有跟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家实验室。”他说。

“美国有很多国家实验室做得非常好,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大科学家甚至诺奖得主;实验室涉足的领域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在该领域立足于世界之林;一些研究甚至为全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梅祥说,“国家实验室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国家更有能力去培育优秀的国家实验室,因为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李灿也坦言:“国家实验室筹建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我感觉得到的很可惜。如果国家实验室建设继续拖延下去,我们会错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比起李灿,王梅祥显得更加乐观:“去年两会,我的一份关于‘全面深化国家实验室建设改革’的提案被选为重点提案,又成为常委会常务委员会督办提案,在今年的首届政协双周座谈会上,财政部还表示对国家实验室已预备了稳定支持,我希望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在今年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